

# 《伤寒论》方证治法的源流及发展

★ 辛智科 (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 西安 710003)

**摘要:**方证治法源于古代,为仲景所创立,《伤寒论》使之系统完善,唐宋后历代医家有所发展,近现代医家研究有所创新。方证是《伤寒论》辨证施治的精华,具有浓厚的中医特色。

**关键词:**医学史;方证;伤寒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R 222.2 **文献标识码:**A

##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reatment Method of Corresponding Prescriptions and Syndromes of *Treatise on Febrile Diseases*

XING Zhi-Ke

Shaanxi Province Institute of TCM, Xi'an 710003

**Abstract:** Treatment method of corresponding prescriptions and syndromes, which started from ancient times, was made by famous doctor Zhang Zhongjin. The system of it was well improved in the book of "Treatise on Febrile Diseases", and it was developed by doctors i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Doctors in modern times have added something new in it. The method is the essence of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which has strong featur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Key Words:** Medical history; Treatment method in corresponding; Prescriptions and syndromes; *Treatise on Febrile Diseases*; Study

方证治法是《伤寒论》临证治病的一大特色。方,指方药,证指证候。方证治法是张仲景首创的,方与证相对,方证相连,方随证出的一种辨证治疗的方法。有汤方辨证、方证辨证、方剂辨证、汤证辨证、方证相对之不同的称谓。作为一种辨证方法称方证辨证较妥,作为一种方证治疗方法,在六经辨证大原则之下,称方证治法似为确切。张仲景开创了方证之学,确立了方证治法,创建了辨证诊治体系,方证治法是张仲景继承和创新相结合而取得的研究成果,自成一家,颇具特色,贡献大,影响深远,实用性强,但遗憾的是却未引起医家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为发扬光大张仲景《伤寒论》所创方证之学,深入研究张仲景辨证施治的精髓,有必要对其渊源及发展作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 1 《伤寒论》方证治法溯源

古代人们随着药物品种的不断发现和增多,用药经验的不断积累,对疾病所出现证候的认识也日益提高,根据不同的证候,选择不同的药物组成复方,并煎熬成汤液,应该说这是治疗水平和方药使用方面的很大进步,也为方证治法奠定了基础。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是迄今为止最早较为完备的医方专书,现存医方 283 方,病名

103 个,用药 247 种,涉及临床各个学科,抄写不晚于秦汉之际<sup>[1]</sup>。有学者认为其成书年代的上限应在春秋战国时期,甚或西周乃至更早<sup>[2]</sup>。全书各个医方没有方名,也未有“汤方”、“汤液”之类字样。《五十二病方》疽病标题下载:“治白薤、黄芪、芍药、桂、姜、椒、茱萸,凡七物。骨疽倍白薤,肉疽倍黄芪,肾疽倍芍药,其余各一。并以三指大撮一入杯酒中,日五六饮之,须已□。”《五十二病方》从伤疮到癰儿癰,都是先述证,后述方药。这首治疽通用方,是最具学术价值的古医方,按不同的疽病,调整药物之间的配伍及剂量比例。显然这是早期辨证施药的思想萌芽,《五十二病方》中的“随症倍药法”是张仲景“辨证论治”学说的先导,也是《伤寒论》方证治法的最早渊源<sup>[3]</sup>。它真实地反映了西汉以前的临床医学和方药学发展的水平<sup>[4]</sup>。

1972 年甘肃武威旱滩坡在一座东汉墓中发现了 92 枚医药简牍,称之为《武威汉代医简》。所载方剂 30 多个,方剂少则 2 味药,多则 15 味药,大都是治疗疑难杂症的方药,如治麻风、风湿、久泄、久痢、久咳等病。简文:“治伤寒逐风方,付子三分,蜀椒三分,泽泻五分,乌喙三分,细辛五分,术五分,凡五物皆治方寸匕,酒饮,日三饮”。牍文:“治久泄肠辟,欧

血□□裹□□□□医不能治,皆射去方黄连四分,黄芩、石脂、龙骨、人参、姜、桂各一分,凡七物皆并治合丸以密,大如弹丸,先哺食以食大汤饮一丸,不知□□□□肠中愚加甘草二分,多血加桂二分,多农加石脂二分……”可见方证治法已在《武威汉代医简》中有所体现。其所载方药技术含量高、实用价值大。在病名的确立、症状的描述、方药及许多术语的应用方面与《伤寒论》有相似之处。《武威汉代医简》是距张仲景 150 年前的医药文献,反映了当时的医药水平和临床现状,文体属临床札记性质的医方书,条文中有关证、方、药、量及煎服法等,对张仲景很可能有一定启发,可以说为《伤寒论》的成书奠定了良好的方药渊源及临证实践基础<sup>[5]</sup>。

在出土的敦煌卷子医书中,收载有署名陶弘景撰的《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一书,保存有古佚书《汤液经法》、《桐如药录》某些内容。陶氏曰:“商有圣相伊尹,撰《汤液经法》三口,为方亦三百六十首,”誉该书“实万代医家之规范,苍生护命之大宝也”。又说:“汉晋以还,诸名医辈,张机、卫汜、华元化……皆当代名贤,咸师式此《汤液经法》,救疾苦,造福含灵”<sup>[6]</sup>。可以看出,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传承《汤液经法》之经方,确有实据。所以,柯雪帆先生认为《汤液经法》是张仲景方证治法的直接源头和创新发展之基础。《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载有大小阴阳旦汤四方,大小四神汤八方等方,陶弘景认为:“外感天行,经方之治,有二旦、六神、大小等汤。昔南阳张机,依此诸方,撰为《伤寒论》一部,疗治明悉,后学咸尊奉之”。有学者就其方剂与《伤寒论》方剂对应比较研究,认为大都取自古代经方,只是张仲景更易方名罢了。易方名只是“张机撰《伤寒论》避道家之称,故其方皆非正名也,但以某药名之,以推主为识耳”,“若能深明此数方者,则庶无蹈险之虞也”。可见方证相对,疗效甚佳。

《五十二病方》、《武威汉代医简》、《汤液经法》的诞生及传播,直接或间接地对张仲景产生了一定的学术影响。古代中医是有医经、经方等学派之分,张仲景是经方派的传人和奠基者。皇甫谧《甲乙经·序》有:“伊尹以元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近世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遗论甚精,皆可施用,得不谓祖述大圣人之意乎?”《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载有“医经七家,经方十一家”,又说:“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结,反之于平;及失其宜者,以热益热,以寒增寒,精气内伤,不见于外,是所独失也”<sup>[7]</sup>。张仲景《伤寒论》的方,被称为

经方,其来源于经方类的《汤液经法》。

可以说,医家长期的临床探索与总结,以及零散的方证治法经验的积累,为张仲景《伤寒论》方证治法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临床基石。所以当代经方大师刘渡舟认为:“要想穿入《伤寒论》这堵墙,必须从方证的大门而入”<sup>[8]</sup>。

## 2 《伤寒论》方证治法体系的确立

《伤寒论》全书 398 条条文,各条文分列于“辨××病脉证并治”之下,其层次是病、证、方证。张仲景首创病下系证,证下系方,方随证出,方证相应,理法方药一体的方证治法体系。辨病证是前提,辨方证是落脚点,也是《伤寒论》辨证施治的特点和精华所在。《伤寒论》398 条,随证出方者有 253 条,占 64% 以上,其中以某汤主之者,或以方名证者占多数。如第 13 条:太阳病、头痛、发热、汗出,恶风者,桂枝汤主之。第 38 条:太阳中风,脉浮紧,发热,恶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烦躁者,大青龙汤主之。第 96 条:伤寒五、六日,中风,往来寒热,胸胁苦满,嘿嘿不欲饮食,心烦喜呕,……小柴胡汤主之。第 318 条:少阴病,四逆,其人或咳,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或泄利下重,四逆散主之。第 386 条:霍乱,头痛发热,身疼痛,热多欲饮者,五苓散主之。寒多不用水者,理中丸主之。诸如此类,都是先述证,证方同条,先证后方,寓证于方,更有以方名证,直呼“桂枝证”、“柴胡汤证”者,如第 34 条:太阳病,桂枝证,医反下之,利遂不止。第 149 条:伤寒五、六日,呕而发热者,柴胡汤证具,而以他药下之,柴胡证仍在者,复与柴胡汤。这是张仲景方证治法思想在条文中典型的文字表达。

《伤寒论》内文虽以条文形式出现,看似零散,实是一个完整、有序的方证治法体系。看似讲临证治法,是讲方证的临床应用,实则每个条文都有丰富的理论作支撑。条文中的证,不是孤立的、个别的症状,也不是症状的随意堆积,而是病因病机作用下出现的相关症状的有机组合。方也不是药物的简单堆积,是药物与剂量组成的整体,组方严谨,药少效宏,配伍灵活。张仲景把复杂、多变、动态的证和方相对应,并随证而变,随证而治,以求方证的最佳对应。张仲景的最大功绩是确立方证治法,是将方药运用规范化、指标化。

## 3 古代医家对《伤寒论》方证治法的研究及进展

自唐宋以后,历代医家对《伤寒论》进行多角度多元化的研究,其中对仲景方证治法的研究成绩显著,对仲景学术思想的传承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代表医家及主要研究方法和特点如下。

3.1 孙思邈以法类方,以方类证,方证同条 唐代著名医家孙思邈在晚年之时,将收集见到的《伤寒杂病论》,视为珍宝,编入《千金翼方》<sup>[9]</sup>,并对其推崇备至,评价甚高,认为“伤寒热病,自古有之,名医睿哲,多所防御,至于仲景,特有神功”,而太医疗疾,“极与仲景本意相反,汤药虽行,百无一效”。以仲景之方“行之以来,未有不验”,(《千金翼方卷九·伤寒上》)疗效的巨大反差,引起了孙思邈的极大学术兴趣和浓厚的钻研精神。对《伤寒论》作了系统精深的研究,鉴于仲景“旧法方证,意义幽隐,乃令近智所迷,览之者造次难悟,中庸之士,绝而不思,故使闾里之中,岁致夭枉之痛,远想令人慨然无已”。(《千金翼方卷九·伤寒上》)他便“以方证同条,比类相附,须有检讨,仓卒易知”(《千金翼方卷九·伤寒上》)的方法,对《伤寒论》进行编次,按方证比附归类,各以类从,条理清晰,易于检索,便于应用。如桂枝汤法 57 证,方 5 首,麻黄汤法 16 证,方 4 首,青龙汤法 4 证,方 2 首,柴胡汤法 15 证,方 7 首等。诊病疗疾,检方证相符而用之,简便易行,疗效卓著。孙思邈是第一个提出“方证”一词的古代医家,能以方证同条编次《伤寒论》,足见其已对仲景方证治法学术思想有深刻而独到的见解和领悟。从此开辟了《伤寒论》类证、类方的方证治法研究,对后世医家颇有启发意义。

3.2 朱肱识证辨脉,以脉类证,据病识证,因证得方 宋代医家朱肱,著《伤寒类证活人书》,成书于 1108 年。朱肱在《伤寒论》研究中,以脉类证,以方类证的方法,研究《伤寒论》诸方的证及方,他强调“治伤寒先须识脉,若不识脉,则表里不分,虚实难辨”,他从经络脉证,辨别表里,阴阳虚实,类证类方,若网在纲,“证之与脉,不可偏废”,其研究切合临床,便于应用,风行一时。“得此书者,虽在崎岖僻陋之邦,道途仓卒之际,据病可以识证,因证可以得方,如执左契,易如反掌,遂使天下伤寒,无横夭之人,其为饶益不可思议”<sup>[10]</sup>。(《伤寒类证活人书·张藏序》)

3.3 柯琴以证名篇,以方名证,方不拘经,六经方证,可辨百病 清代医家柯琴,矢志医道,专研《伤寒论》,卓有成效,著有《伤寒论》四卷(1669 年),《伤寒论翼》二卷(1674 年),《伤寒附翼》二卷,三书合称《伤寒来苏集》。他认为读《伤寒论》“必凝神定志,慧眼静观,逐条细勘,逐句研审”(《伤寒论注·自序》)。在《伤寒论》编次上,既不赞成王叔和之编法,又反对方有执等人的“三纲鼎立”说,他“将仲景书校正而注疏之,分篇汇论,挈其大纲,详其细目,证因类聚,方随附之”。依据六经的方证,分立篇名,重加编次,每经以脉证为总纲,最后以方类证,方随附之。如太阳脉

证列有桂枝汤证、麻黄汤证、葛根汤证、大青龙汤证、五苓散证等。阳明脉证列有栀子豉汤证、白虎汤证、茵陈汤证、承气汤证。少阳脉证列有柴胡汤证、建中汤证、黄连汤证等。太阴脉证列有三白散证。少阴脉证列有麻黄附子汤证、真武汤证等。厥阴脉证下的乌梅丸证、白头翁汤证等。柯琴“以病名篇,而以论次第之,虽非仲景编次,或不失仲景心法”。(《伤寒论注·凡例》)足见他对仲景学术思想有其独到的见解和领悟。

在《伤寒论翼》一书中又提出“六经为百病立法”,反对伤寒三百九十七法之言,扩大其治疗范围,强调有是证,用是药,用方不拘于经和时日,“仲景之方,因证而设,非因经而设,见此证便与此方”<sup>[11]</sup>,这是对仲景方证治法的精辟论述,开创了仲景方证治法编排的新体系。

3.4 尤在泾突出治法,以法类证,类证为纲,方证为目,以切实用 清代医家尤在泾,研究《伤寒论》,突出治法,按治法分类,每经分列纲目,以治法为纲,以汤证及处方为目,其所著《伤寒贯珠集》编排结构颇具特色<sup>[12]</sup>。所列各类治法有正治法、权变法、斡旋法、救逆法、类病法、明辨法、杂治法及温法、清法、下法等,在每法之下列出相应方证。从字面看正治法、权变法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法,但从其主要内容看似为一种分类法,实质则是按证候产生特点对条文进行分类,方从法出,法随证立,随证治之,不同证候,选用相应方药,充分体现辨方证施治的思想,实用性极强。临证学习不拘于治法分类名称的称谓如何,应掌握其学术思想的核心精髓。

#### 4 近现代医对方证的研究

4.1 张锡纯以六经病证为纲,方证为目,中西汇通,诠释方证 近代著名中西医汇通学派医家张锡纯在《医学衷中参西录》一书中,对《伤寒论》进行了深入研究,以六经病证为纲,方证为目,重点诠释四十余首方证,他采取从方证入手研究《伤寒论》,抛弃逐条阐释,从临证实用出发参以西药,对《伤寒论》研究颇有特点。如治桂枝汤证,方中加山药与阿斯匹林,认为一止汗,一发汗,二药并用,得汗即愈,并称较用桂枝汤殊为省事<sup>[13]</sup>。

4.2 曹颖甫经方医案名以汤证,凭证用方 近代经方大师曹颖甫著《经方实验录》,将其经方实验医案,由其门人姜佐景,编按行世。辑选七十五案,皆以汤证名之。曹氏笃信仲景之学,有此证,用此方,得此方,消此证,但凭脉证施治。正如叶橘泉在其书序中评价说:“中医之治疗功效虽在于药物,然绝不是各个药物单独所发挥之效力;而方剂之配合,大有研究

之价值。”“治中医者除深究药物之外,尤须注意经方剂及主治证候之研究。证候者,人体因病理的变化而所显的征象也。古医之无病理学固不可讳,而证候之认识为方药治疗之相对的凭藉。”<sup>[14]</sup>若废弃中医而专研药物,抛弃数千年据证而投方药(经方)的经验,岂不悲哉,方之治疗对象是证候,为曹氏临证遵循而实践之,“其功实不在仲景下也”,“盖中医之长,不在乎理论,而重辨证,果凭证用方,已可生死人而肉白骨”<sup>[15]</sup>。

4.3 胡希恕辨六经,析八纲,再辨证,后选方 当代著名的经方大家胡希恕(1898~1984),毕生致力于《伤寒论》的研究,颇有诸多建树,其学术思想及成果集中反映于《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胡希恕》一书。他对方证辨证的研究和认识,对今人颇多启迪。认为“临证有无疗效,决定于方证对应与否,执一法,不如守一方”。充分认识到方证是《伤寒论》的精华,“方证较之证型更为直接,更为深入,且具有定性、定量的性质”<sup>[15]</sup>。临床上不论采用那种辨证方法,最终都要落实在方证上。胡先生认为“方证辨证是六经、八纲辨证的继续,更是辨证的尖端”。

4.4 刘渡舟提出,要想穿《伤寒论》这堵墙,必须从方证的大门而入 当代伤寒泰斗刘渡舟教授,致力《伤寒论》研究,善用经方,创立“方证相对论”,他对《伤寒论》研究终生不遗余力,为之上下求索,晚年终有所悟,提出“要想穿《伤寒论》这堵墙,必须从方证的大门而入”。并对方证进行深入探讨,认为“认识疾病在于证,治疗疾病在于方。方与证乃是伤寒学的关键,而为历代医家所重视,所以,方证相对论的提出,起到了非凡的积极作用。”<sup>[16]</sup>同时又提出:“方与证的对应,比类相附之际,张仲景慎思之、明辨之,有机地、也很巧妙地揉进了辨析证候的理论与思想方法。它的作用能把僵化的病症,变成了活的灵魂。”<sup>[17]</sup>“方证相对就可以发挥经方治病的作用,颇有言下顿悟之妙。”<sup>[18]</sup>作为一代伤寒大家,能有此认识,可谓是终其一生学习和实践经验的卓识之见。

4.5 张长恩、冯世伦竭力构建仲景方证学 张长恩、冯世伦是继胡希恕、刘渡舟等伤寒大家之后,当代对仲景方证学研究卓有成效的代表性医家,他们对《伤寒论》的方证学研究可谓具有系统、全面及独到之处。著成《中国汤液方证》(仲景方证学)、《中国汤液经方》等书,对方证的概念、渊源、结构、内涵及外延以及具体 113 个方证进行详细阐释。认为:“仲景方证学是沟通中医理论和临床实践的桥梁学科,在中医学领域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伤寒论》正

是由于在分经分证的基础上列述了若干个方证,为辨证论治奠定了基础,才使其至今光彩夺目,盛传不衰。《伤寒论》如果撇开具体的方证辨识,则不会具备现今的学术价值。”<sup>[19]</sup>

近年来,随着中医现代化研究的深入,学术界在病证研究的基础上,对方证尤为关注,“方证相应”“方证相关”的命题不时见诸于报刊杂志,仲景的方证治法研究有扩大和延伸之势,试图寻求方证的最佳结合和配方。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应以仲景的方证治法为核心,重点研究,后世时方成千上万,其方虽也有方证相应,但其和经方的方证相应似有差别,不宜任意扩大。

综上所述,方证治法,渊源于古代,为仲景所创立,《伤寒论》使之系统完善,唐宋后历代医家有所发展,方证是《伤寒论》辨证施治的精华,具有浓厚的中医特色,应努力发掘,传承弘扬,熟悉和掌握方证这一中医辨证的尖端,是提升临证诊疗水平的关键。

#### 参考文献

- [1]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 五十二病方[M]. 北京:文物出版社, 1979. 179
- [2] 尚志钧. 从药物产地看《五十二病方》的产生时代[J]. 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 1986, (4): 44
- [3] 高春媛, 陶广正. 文物考古与中医学[M]. 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3. 89
- [4] 周一谋, 萧佐桃. 马王堆医书考注[M]. 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4. 49
- [5] 张定华, 孙其斌. 从《武威汉简》看仲景学说[J]. 甘肃中医, 1996, (2): 6
- [6] 马继兴编. 敦煌古医籍考释[M]. 南昌: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8. 127~132
- [7] 班固. 汉书·艺文志第十[M]. 见:二十五史,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533
- [8] 刘渡舟. 方证相对论[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1996, 19(1): 3
- [9] 孙思邈. 千金翼方[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1955. 87~122
- [10] 传世藏书编委会. 传世藏书·子库·医部[M]. 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1995. 762~765
- [11] 柯琴. 伤寒来苏集[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5
- [12] 尤怡. 伤寒贯珠集[M]. 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 1997
- [13] 张锡纯. 医学衷中参西录[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1977. 396
- [14] 曹颖甫. 经方实验录[M]. 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4. 6~16
- [15] 李国臣. 胡希恕方证辨证说略[J]. 上海中医药杂志, 2003, 37(10): 39~41
- [16] 刘渡舟. 方证相对论[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1996, 19(1): 4
- [17] 刘渡舟. 辨证论治的历史和方法[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2000, 23(2): 1
- [18] 刘渡舟. 伤寒论临证指要[M]. 北京:学苑出版社, 2005. 105
- [19] 张长恩. 中国汤液方证[M]. 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 2005. 4

(收稿日期:2007-03-06)